

第一卷

罗常培文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常培文集 第1卷/《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编.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5328-2682-1

I. 罗… II. 罗…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122 号

### 罗常培文集 第一卷

LUO CHANGPEI WENJI Di-yi Juan

- 
-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 电 话: (0531)2023919 传真: 2011455
-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2000
-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 印 张: 20.625 印张
- 插 页: 7 插页
- 字 数: 482 千字
- 书 号: ISBN 7-5328-2682-1/H·71
- 定 价: 48.0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罗常培文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吕叔湘 吴宗济 马学良 邢公畹  
张清常 高华年

主 编 王 均

副主编 周定一 高更生 孙宏开 尉迟治平

编 委(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蔡美彪 高更生 李钊祥 罗慎仪

罗圣仪 邵荣芬 隋千存 孙宏开

孙永大, 王 均 杨耐思 尉迟治平

周定一

责任编辑 隋千存 答 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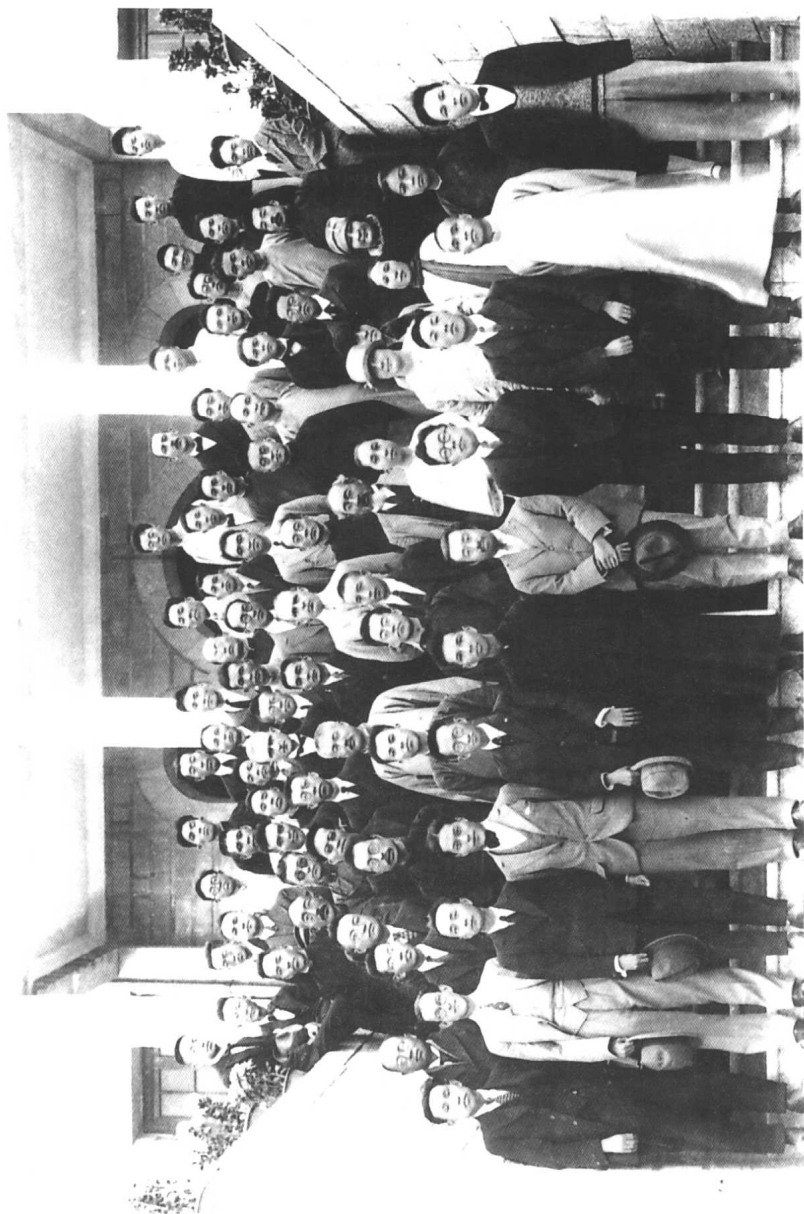
罗常培



一次不可再得的盛大聚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欢迎蔡元培先生



。1931年春摄于北海静心斋沁泉廊畔。自下第一排右起第二人为罗常培。



1925年在厦门大学。自下上数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第三人戴眼镜穿黑色长衫者为罗常培。

---

---

## 序

罗常培(莘田)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门科学不懈的开拓者。中国语言学界一致称道莘田先生是“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这可以认为是对先生一生准确的定评。罗先生三十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大学教书和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罗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以下的特点:一是目的性强,或是从教学实践出发,或是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都有一定的计划;二是理论和实际并重,普及与提高兼顾;三是研究范围的层层扩展,步步深入,精心构思,时有新论。罗先生的治学原则是:抽丝剥茧,穷源竟委,博引旁征,一丝不苟。他对己对人都很严格,对后辈更是耳提面命,爱之弥深。特别是他对人一贯诚恳真挚,坦率透明,正直无私,所以能吸引和团结同行,倾心培植后辈,从而形成了一支现代语言学队伍。

罗先生的杰出贡献在于:一、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和改造传统语文学,使之成为现代中国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结合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音韵研究,进行了中国音韵史的系统研究,注意填补历史的空白,并为后人提供丰富使用的资料。二、用批判吸收的眼光对域外中国音韵学研究做了认真的梳理和评介。三、融会中西,多所开拓,在研究目的、取材方法上都有新的推进。四、从汉语方言研究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五、把语言研究的领域扩展到语言与社会历史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方面。六、语言研究结合语言使用的实际,并应



用于实际。七、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八、为建立语言学队伍,培养人才,做了不懈的努力。

## 一 音韵学大师 继往开来

罗先生对传统语文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前人操术弗精,工具不备……每致考古功多,审音功浅”,且往往“凭臆立说,每多遗失”,因而采取“审音、明变、旁证、祛妄”的方法,比较诸家论述,钩稽参证,反复推求,用现代语音学的科学方法阐明音韵学、等韵学中的实质问题,终于使向来被认为玄奥难解的“绝学”化为便于理解的中国语言科学的基本学科。专著《汉语音韵学导论》,论文《释重轻》、《释内外转》、《〈通志·七音略〉研究》、《音韵学不是绝学》等,都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

在汉语音韵演变史的研究方面,莘田先生着力很多,贡献尤大。他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参酌宋代吴棫以来特别是清代诸家周秦古音研究,利用佛经中的梵文字母译音和汉梵对音中的用字及切注、藏译梵音、写本残卷或碑刻中的藏汉对音、域外汉字的注音材料以及各种韵书及其写本残卷中的反切、各种韵表、韵图、韵谱及其说解,古代诗文韵读(特别注意考定作者的生卒年代、籍贯及活动地域)以及现代方言等各种资料,对汉语不同时代的历史音韵作系统构拟与考定,并由此开展汉语音韵演变的历史研究。其中有关周秦古音和隋唐至宋《切韵》系统的中古音,前人研究较多,莘田先生也有自己的卓见。他还把研究的范围延伸到隋唐以前和唐宋以后,既着意于填补历史的空白,又注意到从古到今的方言流变。这是莘田先生研究方向和治学方法的特色。所以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在横的方面,都能视野广阔,鞭辟入里。为了便于后人研究,莘田先生除主持

编印《十韵汇编》和影印《通志·七音略》等研究中古音的音韵学书籍外,还为研究近代汉语音韵编著了重要资料《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蔡美彪合编)等。

## 二 立足中国 借鉴域外

中国音韵学研究要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方法。30年代前期,罗先生与赵元任先生、李方桂先生合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一件大事。这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重托的任务。本来,译书从来不能列入史语所的计划,此为例外,其重要性可知。按照三位先生商定的译法,一要译得忠实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二要改其错误,三要加入新材料,四是改用国际音标注音,五是一部分重编。这实际是译中有审、校、改、著,没有深厚的功力显然是难以兼及的。难怪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称赞这部译著:“此固近年我国译学上未有之巨业,瞻望明代译天算诸贤,可无愧焉。”原著者在中译本赠序中也盛赞“他们三位全是在这门学问里极精彩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语言学史上全有极重要的论著,全给过我许多益处”,而对译文的流畅真切,特别对其内容上的修改润色赞不绝口!三位先生之被称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当然不是由于他们合译了这部巨著,但史语所之所以选请三位先生合译此书,也决非偶然。

明季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罗马字母音译转写是研究当代汉语音韵的重要资料,过去没有人注意过。而罗先生则在1930年就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41年又根据稍后的文献资料写出《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此外,罗先生对武尔披齐利、查尔默、商克等人汉语音韵学著作的评述,专论《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

响》，以及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讲义《域外中国声韵学论著述评》，都表现出莘田先生敏锐的眼力。

### 三 从汉语方言研究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罗先生对于汉语方言研究，早期兴趣仍在历史语言学方面。在《汉语方言研究小史》中，罗先生批评西洋人的汉语方言研究时说，“其实研究现代方言唯一有效的出发点就是古音”，那“才能对于汉语音韵学有相当的贡献”。对于前人研究方言的态度，罗先生反对他们“以韵书矫正方言”的立场，认为“与其援古正今，还不如据今考古好呢”！《唐五代西北方音》正是“用现代语音学方法去考证汉语古代方音”的代表作，因为“必须考证出古代方音来，然后才能窥见周秦古音的真相”。从罗先生调查厦门方音、临川方音的缘起，可看出罗先生的兴趣更多地是在音韵演变史方面。《厦门音系》有厦门音与漳州十五音及与《广韵》的比较，书中着重指出“厦音特征，足以窥见古今流变者”在声母和韵母方面的情况。罗先生研究临川音系兴趣的产生，是因为偶然发现临川方音有保持闭口韵尾等三个特点。他又注意到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跟推行国语的关系，所以《临川音系》兼有临川音与《广韵》及与北京音的比较。罗先生还调查过徽州6县46个点的方言。

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迁到昆明，莘田先生和李方桂先生等认为应该“尽量发掘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便“由两三个中年人领导几个年轻人”对云南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在《语言学在云南》一文里，莘田先生把1938—1943年之间在云南进行的语言和方言调查归纳为5纲41目，讲到工作的旨趣时说：“我们何妨仿效 Malinowski 教授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在太平洋 Trobriand 小岛上的精神,充分利用现在的环境,尽量搜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语言材料,给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石,岂不给中国语言学史添了一张新页吗?”在日机轰炸的警报声中,在继续进行研究、教学、主持系务、参加联合大学校务会议及有关专委会的同时,莘田先生抓紧一切机会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终于在1940年从云南大学找到发音人,记录了丽江么些(纳西)语十几则故事和几首歌谣;1942—1943年,三赴大理,从大理师范和喜洲五台中学等校的边疆学生中找到发音人,先后记录了莲山摆夷(傣)语,福贡傈僳语,贡山傈(独龙)语,怒语,茶山、浪速、山头三种景颇语和9县11个点的民家(白)语方言。已发表的著作有《莲山摆夷语初探》(与邢庆兰先生合著)、《贡山傈语初探》(中文、英文)、《贡山怒语初探叙论》等。他以身作则,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推动工作。

莘田先生十分强调要注意使用我国的语言材料编写语言学教材,也可借此丰富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因此,后来罗先生和王均合写《普通语音学纲要》时,确定这样的编写原则:“应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联系中国语言的具体实际,所举的例子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没有的然后举各地方言,汉语没有的再举兄弟民族的语言……也引用一些外国语言的例子,以资参证。”

#### 四 为训诂学建构新的体系

罗先生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曾开训诂学一课,内容纲要分为:“叙论——训诂学的定义,训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何谓意义;意义变迁的类型;词汇的性质与范围;历史训诂书述要;训诂释例;汉语词系研究;编纂经籍字典的计划;语义的历史研究;总结。”这

种新的体系展现出罗先生在研究训诂学方面,融通中西,借鉴西方词汇学、语义学、语源学的成果,突破了传统的训诂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建立了具有汉语特色的框架,在要求、取材和方法上都有新的推进。罗先生认为既要分析各时代词义演变累积的基层,又要推究词义的死亡、转变和新生的社会条件;取材范围应包括经籍、子史、词书、专集、语录、笔记、小说、戏剧以至民间谚语、大众文艺;研究方法,一方面要顺序地从经籍递推到大众口语,另一方面还得根据大众的词汇逆溯到它们的来源。罗先生关于训诂学的讲义,可惜没有整理成书,但发凡起例,对尔后汉语训诂学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 五 开创沟通我国语言学与文化学的坦途

语言本来是跟民族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但这往往会被语言学家忽略。罗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临川方言时,就已通过族谱、史书,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证客赣方言的关系,随后,他又接受萨丕尔、帕默、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明确提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40年代,他又通过研究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论证了古“南诏国”的建国者是藏缅族的先人,或者说建立南诏国的应当是有父子连名文化特征的彝族或有连名遗迹的“爨夷”或“白夷”即民家(白)族,而不可能是没有这种习俗的被称做“摆夷”的傣族。这种观点现在可以说已成定论。

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实际是罗先生40年代的研究成果,该书有意识地、系统地用大量语言实例,特别是语言的词汇及其涵义,阐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沟通我国语言学与人类学及人类

社会文化史的关系方面,有开创性的意义,被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 六 力促语言学介入社会生活

语言研究与社会生活本有密切的关系。莘田先生早年学习过王照的“官话字母”,后来又学习研究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做了有关“国语运动”的历史研究,写出了《国音字母演变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1959年文字改革出版社新版改名为《汉语拼音字母演变史》),并在北平《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

1941年4月24日,莘田先生以《中国人与中国文》为题在昆明广播电台讲演,在谈到汉字改革问题时,他曾积极而清醒地说:“照我的意见未尝不可……用注音字母或国语罗马字来代替汉字,以减少儿童识字的困难。从初中以上就得用注音字母辅助读音逐渐认识汉字,并试着阅读用汉字印行的书籍。要想完全废弃汉字,单用拼音文字来代替,那似乎为期还远得很。”(多年的经验证明,先学拼音确实是初小语文教学的好办法,尽管认汉字完全不必等到初中以上。)

莘田先生强烈反对社会上的复古风气。在《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1942年7月1日在昆明广播电台演讲)中说:“从文学史上看,新旧两派总是互相消长的。新的稍微消沉一点儿,旧的就会在那儿蠕动。它会借着政治势力,利用人类惰性,让人们不知不觉地走向复古的路!”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不正是这样吗?先生讲到西南联大所用的大一国文读本,古诗文和现代文学作品都有恰当的比例,而当时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读本编定委员会却只选文言文,不选语体文。莘田先生对此愤慨地说:“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正是新旧文

学消长的枢机!”

罗先生也很注意向语言艺术家普及音韵学知识,例如1935年发表论文《音韵学与戏剧》,同年又为北京青年会剧团演讲《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等。罗先生还很注意为通俗文学作家服务。《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一书(1942年初版,1950年、1956年重印)是一部对十三辙沿革有精辟见解的科学研究著作,也是对戏剧、曲艺、音韵研究者、民间文艺创作者有很高实用价值的北京口语韵典。他使俗曲成为研究对象,登上了大雅之堂。

## 七 为祖国语言学和语言规划鞠躬尽瘁

1950年莘田先生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所在莘田先生领导下,除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开展汉语语法、方言、词汇、文字、音韵和语音实验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外,又很早就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帮助需要解决文字问题的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后,就在这个研究组的基础上于1956年12月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2月6日至13日,科学院语言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召开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这三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有关我国语言规划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会议,罗先生都是领导小组成员,并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做了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与吕叔湘先生合作)。

从1952年起,罗先生便因高血压症长期患病,但他仍坚持为汉语规范化、汉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语文建设抱病工作。

1958年1月他还在《人民日报》、《文字改革》、《民族团结》等报刊上发表宣传文字改革和民族团结的文章。

## 八 一代宗师 风范永存

罗先生1919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哲学系学习两年,接受了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1923年(24岁)受聘为西安西北大学教授,兼国学专修科主任,接替著名学者胡小石,教好几门课。他打定主意埋头苦干,备起课来一丝不苟,毫不含糊,可以说罗先生是为授业而研究,又以研究结果提炼融入教材之中。所以一本七万字的《汉语音韵学导论》,从讲义到出版,他八易其稿,犹感不足,还想用语体文彻底改写。罗先生记着自己上大学时治学的艰辛,所以他不但授业解惑力求透彻,而且传授方法,“要把金针度于人”。罗先生授课的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在西南联大是有名的。

莘田先生平常教导学生“教书要深入浅出,科研要小题大做”,言简意赅,使人毕生受用。1942年,莘田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了题为《研究工作的性质》的演讲。先生指出:“大纲”、“概论”、“通史”、“述评”只能指示门径,研究则不能以此作为根据。他说:“一个有系统的研究,第一得要有问题——问题的产生或从观察精确引起,或从‘读书得间’而来。第二得有见解——有了问题就该着手搜集材料,相当数量的事实 and 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不过材料的积聚和剖析需要功力,材料的组织和融会贯通,需要理解。而科学的精诣,就在于研究者要有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第三要有证据——假说能否变成通则,就看证据充分不充分。一个严正的研究者得要抱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态度。第四得要有结论——单有材料而没有意见,就会流于破碎;单有意见而没有证据,就会流于空疏;从材料提出



假设,拿证据证成通则,自然而然就得出顺理成章的结论来。一个研究工作者若是没有果断确切的结论,那就像画龙没有点睛,做衣服没装领子一样!”这样,对研究工作的性质、步骤和方法,就了如指掌了。

办杂志,既是为了鼓励语言研究,活跃学术空气,也是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做语言科普工作,提高读者的语言学水平。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与语言所共同创办《中国语文》杂志,罗先生担任总编辑。1956年语言所创办《语言研究》,罗先生担任常务编委。现在,先生离开我们已40年了,他生前播下的种子,已经生长成材,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罗常培先生不愧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卓越的学术带头人和爱祖国、爱人民的忠贞的社会活动家。不幸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到1958年12月13日先生离开我们时,他才刚满59岁!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十多部专著和一百几十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为建立和发展中国语言学,组织队伍,培养人才,并积极宣传倡导祖国语文的规范化、现代化,为贯彻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指导开展民族语文研究和实际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先导的工作。

罗先生的业绩是不朽的,正如魏建功先生所说:“现在我们的语言学有那么多方面,都和莘田先生有关系,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学术是不断发展的,因而总是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学术的门类是随着实际的需要和既有的基础而不断增多的,罗先生生前曾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我们的工作应为后人铺路”。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今天中国语言学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40年前有了不小的进展,这正是罗先生的愿望。我们编辑《罗常培文集》,首先是因为罗先生的著作并不因时间